



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年3月9日至20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和
题为“2000年妇女：二十一
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和平之路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6/31号决议第36和第37段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陈述

《北京行动纲要》、《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和其他联合国文件以及联合国和联合国会员国领导人声明设定的标准要求政治意愿至上，并开展积极的妇女运动。

随着 1995 年北京论坛和 20 世纪妇女运动作为妇女如何成立组织和建立网络的范例，并根据社会学深度研究的结论，召开联合国第五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作为激励全球妇女运动的一种手段的必要性已不言而喻。没有各阶层民间社会的参与，妇女和女童的目标则无法实现。人们必须了解、关注将发生的真实改变，富有同情心并受之激励。对于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尤其是太年轻而无法亲临北京参加会议的年轻女性而言，本次会议对她们同样重要，正如奥林匹克运动会是面向所有运动员的。与会者可以使用移动电话通过社交网络分享信息、故事和图片。世界会知道与会者所了解的妇女地位，可以预见，这将是既令人震惊又鼓舞人心的。

妇女在全世界取得的历史性收获证明了一项在最近的研究中强烈证实的原则：只有当位于权利顶端的掌权者被由下而上的女权运动所推动，妇女才能够在—一个主要由男性握权的世界中获得权利。在印度，当妇女们走上街头抗议警察对强奸事件的漠视，才能激起政治意志制定和执行法律以保护妇女。四十年的研究（1975 至 2005 年间在 70 个国家收集的数据，Mala Htun 和 S. Laurel Weldon, 2012 年）发现，能够带来改变的不是自由政治，不是政府中妇女的代表性，不是国民财富，而是基层的女权运动，只有强大的女权运动能够让女性围绕她们的最高优先级问题表达意愿和成立组织。否则，妇女只能作为局外人，从属于男性的需求，或服从于机制体制或政党的优先排序。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大会主席于 2012 年 3 月 8 日国际妇女节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大会成员通过关于举办全球妇女大会的决议。“鉴于女性占人类总数的一半，并鉴于妇女问题对全球进步的重要性和关联性，召开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已是当务之急。”在声明中，他们指出本次会议可以解决自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第四次会议以来新出现的问题，其中包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的执行、获得体面工作的平等机会、援助实效性、粮食安全、贩运、毒品、移徙、环境、气候变化和信息技术等对妇女造成影响的问题。

秘书长关于召开第五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要求尚未被撤回，也未被采纳。有一个会员国可再次提出这一问题。目前基层宣传工作的重点放在印度，因为印度可以提出并主办第五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在印度独立日，印度新任总理在第一次重要讲话（2014 年 8 月 14 日）中谈到需要终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以及印度强奸文化的耻辱。秘书长潘基文于 2008 年上任，以终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为己任，他创建的联合反暴力方案作为联合国方案，指出：“只有通过有意义的行动

和各国政府持续的政治承诺，并以充足的资源作为后盾，这一愿景才能得以实现。”这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愿景，可能会产生先进而富于同情心的文件和体制革新；但是，由于存在自下而上的压力，不能得到广泛的推行。

联合国必须支持众多与会者获得签证，且需要以金融手段激励个人和组织认可与支持年轻女性领导人并批准年长的女性领导人，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参加。与奖学金或助学金类似，此种“姊妹社”将崇尚利他主义、服务性、领导才能和行动主义。它将为与会者提供资金支持和关系支持，将睿智的老年女性和青年领导人汇集在一起。关注类似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将分享各自的解决方案。与会者将了解他人分享的价值观和愿景，并能够在会后仍保持联系。此次会议的成果将是基层领导得以发展，她们能够传播并呼吁世界各地其他女性的发展。

与会的女性将成长为更大规模的领导角色：学习北京的先例，大家互相借鉴互为榜样。

当如今已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谈到当年作为非政府组织代表在怀柔的论坛参加北京的妇女问题世界会议时，她们将那次会议当作自己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绿带运动积极分子 Wangari Maathai 站了出来，而明尼阿波里斯市的女孩也这样做了，当她们参加会议时才 13 和 14 岁，那次会议对她们大学生活目标和工作目标都产生了影响。这是改变人生的事件，能促进在认知、同情心方面的成长，以及对你所支持的妇女的勇气和领导能力的钦佩，在这种情况下，你自身也有望取得同样的成就。有机会了解和学习别人的故事，他们的生活和环境、肤色、宗教信仰或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但成为了朋友，这能够拓宽一个人的世界观，让朋友不再“陌生”。曾参加北京会议的许多妇女明白，如果不是参加会议随之拓宽了潜在的选择，她们不会获得现在的职位和职业。女性从彼此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更是互为榜样：参加抱负和想象从你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可能性开始产生。加上参加第五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将产生的组织和网络的支持，这将培养出下一代的女性领导人。

女性具有处于危机中的世界所需要的性别特质，第五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所培养的女性领导人越多，世界将更加美好。

女性同胞了解“母亲 39 议程”，这是将每位母亲希望自己孩子能得到的东西提供给每一个孩子：安全地生活而无需害怕身体暴力或情感暴力、良好的食物、安全饮用水、教育、医疗保健。这发生在种族灭绝后的卢旺达；女性如今占多数，成为决策者。妇女在自己的孩子遭到屠杀后领养了沦为孤儿的孩子。妇女成为各村庄的领导，且女性代表在议会中占大多数。她们在新基础设施的建设中以人们的基本需求为本：如安全饮用水、诊所、道路、可信任的警察、学校等事项。她们互相协作做出决策，这是女性所具有的性别优势，特别是在压力环境下。

研究表明，女性对压力会做出“照料与扶助”的反应，这是她们谈论局势和可能的解决方案时的一种催产素粘合激素反应，而男性的反应是“逃跑或战斗”和孤立或变得有攻击性，这是一种肾上腺素加睾酮的反应。（S.Taylor 等，2000年）根据最近的研究，女性在有压力的情况下与他人更为调和，并能做出更好的决策。而男性在压力下会冒更大的风险，变得更加专注于大的胜利，即使这种胜利的代价较高且可能性较低；而女性倾向于寻求更小但更可靠的成功。处于压力下的女性发现比平时更容易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处于压力中的男性刚刚相反，他们更以自我为中心。

目前关于压力与性别差异的研究支持妇女参与决策的需求。越多的女性被认为有能力且能看到对方的能力，则她们越有可能融入这些角色，为此，第五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众多与会人员将更为融洽投合。

2000年，被称为“妇女、和平与安全决议”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325号决议获得通过。该决议认识到，妇女应参与到和平进程的各个阶段，目前我们的研究对为何女性应参与给与支持。需要落实的是所有相关方应意识到这些性别差距，认知能得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成长，有能力和自信的女性能融入这些角色。